

读书观点

朱熹“理一分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现代价值

□罗付灵

21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在跨文化视域下,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现代转化,能够为解决各种文化间的冲突,和谐相处贡献智慧。

“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最早见于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该书言:“《西铭》名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穷。”这是伊川用以说明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主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差别,即儒者虽本乎一仁爱之理(理一),但其发用,在不同的对象及处境中是可以有不同表现的,以至等差(分殊),故谓之理一而分殊。相比之下,墨子兼爱,把自家父子与别人父子一般看,违反了天生物原是一本的道理,故谓之二本而无穷。从儒家的观点看,墨家兼爱实知(道理上的一)一本,而不知(实践上的)分殊。这是“理一分殊”思想在道德实践层面上的意思。

后来,杨时又赋予“理一分殊”普遍意义,使之成为道南学派一个重要的理学范畴。他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伦理道德的意蕴。

杨时的弟子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谓也。”这就明确指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并将之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其师“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理之用”的重要性,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

“知”字上用力,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这一思想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

道南学派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是道南学派的重要理论特征。

朱熹对《西铭》的“理一分殊”之论极为赞赏,说“《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句句见理一分殊”,又以“月印万川”作喻“物物一太极”,把“理一分殊”思想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来讨论。他认为所谓“理一”,就是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总的“理”,一个总的根源;所谓“分殊”,就是万事万物各具一“理”,每一个事物之“理”,是总的“理”的反映。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这里所说的“理”,具有一本万殊的性质。“理”既体现在宇宙中,又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之中,体现在宇宙中的“理”和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中的“理”,类似于佛教“月印万川”。万事万物统一于“理”,而又是“理”的具体表现,体现着“理”的整体。这就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所主张的从“万殊”到“理一”的认知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于分门别类的研究,进而发展到整体综合研究的过程也有共通之处。由此,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现代学者应不局限于传统哲学从伦理学或宇宙论的层面来进行诠释,而应通过对“理一分殊”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释来解决跨文化交际的困境。我们可以把“理一分殊”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即“理一分殊”的价值原则——“理一”是指一切分殊之德其本于

同一的价值根源;“分殊”指的是同价值根源针对不同的对象而为不同的面向和维度。

这种“理一分殊”原则的可能性,正是基于朱熹思想具有开放的精神传统。所谓开放,指的是不去固守唯一的价值体系,而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有限性,愿意“倾听”别人的想法,也愿意通过“交流”去了解别人,并通过自我的反省批判以达成对自我全新的理解。这种进行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不仅不是自我的否定,反而是自我的更新和完成。

朱熹在构建思想体系时,不只是局限对本土文化各种学说的兼收并蓄,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也采取了综合融会的开放态度。他通过批判来融合佛教思想,从而为儒学的哲理化开出了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这也正是刘述先所说的,我们应“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传统保持一种批评反省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对于其他传统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现在看来,“理一分殊”正是朱熹解决不同文明传统、价值冲突上最深刻的见解,也是我们把握宋明理学传统的一条基本线索。“理”不仅可以贯通古今,也可以贯通中西,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既能对话又有立场,既能融合又彼此独立。

“理一分殊”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运用到“全球价值观”的探求上。儒学与其他文化传统一样,都具有“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提升灵魂”之功能。这一宗教性之“理”是统一的,只是实现的途径各异,由此而产生了“分殊”的各区域文化。可见,“理一”并非一个知识论的体系,它是一个“规约”原则,而非“构成”原则。这个“理一”显然是就儒学的超越性而言的,也是引导我们去探寻那个普遍性价值的一个方向。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即使有“万殊”的存在,我们也会尽量寻求“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之道,而不把矛

盾冲突当作终极的东西。

朱熹的“理一分殊”,其实就是一种普世主义,具有某种普遍性,但它的表现则可依不同时空条件下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文化对话时,凭借这一原则,一方面可以在分歧、冲突中参照“多元中的一元”,另一方面又可以寻求“歧义中的统一”。

朱熹借用“月印万川”之喻,将“理一分殊”形而上学化。在“月印万川”视野下,“理一分殊”不再只是一种伦理观念,而是变成了认识论、方法论。月亮投射在不同的水面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意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体认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们可以透过对“理一分殊”的诠释,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斥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朱熹的“月印万川”之喻可以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

今天,一个文化传统应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元素,在全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和丰富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说,每一个传统都应该努力透过对话交流、多元互济,为世界和平相处,找到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要尽量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理解其他文明的价值观。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交流才是“多元互济”,才能在自身文化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必须有助于人性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提升。朱子学中追求人性合理的因素,肯定人的尊严,可以为现代人格和人权理论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作者单位:武夷学院)

新书纵览

《五四婚姻》

孔慧怡 著 岳麓书社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变化。女性运动也走到了重要节点,年轻一代提出了“新女性”的观念,倡导“婚恋自主”与“人格独立”,无形中改写了“新女性”“旧女性”两代中国女性的人生。本书重新讲述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的婚恋故事,展现巨变时代中“新”“旧”两代女性波澜起伏的命运。她们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观念,反思五四史观对女性的论述和表达。

《惟王受年》

兰德 著 王泽 杨姚瑶 译 东方出版中心



以关中盆地为中心,本书详细考察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商、周时期,特别是秦从边陲小国到称霸天下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的,政治组织又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环境,不断增强对农民和农业资源汲取能力,从而兴起并逐步发展壮大的。通过论述国家政治结构复杂化与农业生态系统扩大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指出国家的形成是地球环境史上的重要一步,而中国帝制的建立则是东亚环境史上的关键事件。书中最后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华帝国如何塑造环境?政治体对环境的反作用力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涉及我们的未来。

《吃辣》

达白安 著 董建中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当今的中国,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菜肴精妙和多样化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口味、地域和适应性,不仅影响了烹饪,还影响了医疗实践和社会生活。本书充分利用各时期的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等资料,配以生动的插图和精心收集的食谱,探索了辣椒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变为风靡全中国的,辣椒的传播又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辣”的含义和文化意蕴。

灯下漫笔

文坛祖母和小读者尺牍情深

□徐莹

冰心文学创作长达70余年,晚年被誉为“文坛祖母”,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儿童文学创作始于1923年,几十年间用自己饱含爱和温暖的文字呵护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从而拥有了不计其数的忠实小读者。

1923年7月下旬,《晨报副刊》新开辟了“儿童世界”专栏。冰心看到专栏当时还只能刊登翻译的外国童话,就考虑着以新的写作样式写一些专给孩子们看的文章,于是通讯《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通过专栏与小读者见面了。8月,冰心赴美留学,因肺气管扩张出血住进了青山沙壤疗养院休养,其间得到来自异国老师、同学、友人的关爱……远行路上对故园亲人的牵挂,异国他乡感受到的真情厚意,无不令冰心动容,也促使她确立了“爱的哲学”思想,抒写下“有了爱便是一切”的感受,同时也确定了最值得写给孩子们的主题——爱。

为了缩短自己与儿童读者的距离,避免孩子们厌烦的说教口吻,冰心自我定位为“一个少年儿童的朋友,采用写信的形式与孩子们平等对话,娓娓而谈,于是便有了儿童文学作品《寄小读者》。由于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寄小读者》内的文章陆续发表及至作品集出版后,拥有了大批的小读者。

1923—1926年《寄小读者》问世后,冰心又于1958—1959年创作《再寄小读者》,1978—1980年创作《三寄小读者》。书信体的形式依旧很有效,亲切的称呼,细腻讲述,循循善诱的启发,拉近了作者和小读者

间的距离,小读者从冰心奶奶的文章中获得了滋养心灵的精神力量。随着冰心的部分篇目收录进20世纪80年代的语文课本,冰心的名字与“70后”“80后”的童年更加紧密相连,冰心的小读者群随之也再一次壮大。

十来岁正是努力尝试形成独特自我,走向自主和独立的年纪,不想成为大人的附属品,平等对话是很多孩子的心理诉求,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和心里话说给更能理解自己的冰心奶奶听,成了孩子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小读者们也学着给冰心奶奶写信诉说心绪,表达自我。

冰心晚年为支持中国文学事业,把手稿、书信、字画等个人物品无偿捐赠给了新建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小读者来信”。这些小读者来信最早始于“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最晚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持续了近20年,可以说冰心的小读者群是因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加入而不断壮大的。来信在空间上则几乎包括了全国各个省份,有城市也有乡村,从山区到水乡,从草原到海岛,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冰心的小读者。

这批小读者来信其实还不是全部,当初《寄小读者》发表时,冰心就开始收到小读者的信件,表达自己阅读文章的想法。这些来自小读者的真实反馈,给冰心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她将小读者的信保存起来,收藏他们珍贵的童心。可惜的是,这批信件全部毁于战火,令冰心痛惜不已。曾经的遗憾在和平的日子里得以弥补,耄耋之年的冰心一如既往地珍视小读者的来信,因为每一封

信给老人带来的都是童真的爱,弥足珍贵。

据冰心的外孙陈钢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冰心常常坐在写字台前用剪刀拆分全国各地少年儿童的来信,每天少则几封,多则十几封。在信中,小读者会亲昵地称冰心为“奶奶”,会关心问候奶奶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会认真回答冰心奶奶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也十分乐于和冰心奶奶分享自己的快乐,介绍自己的学校、家乡并向冰心奶奶发出热情的邀请,还会把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苦恼向冰心奶奶倾诉,寻求解惑。有些信里还带着小读者为冰心奶奶画的画、制作的贺卡。

孩子们的信里没有大事件,就像冰心的文章中没有大道理的说教一样,然而童言稚语流露出的是一片纯真童心,是孩子们对冰心奶奶的爱,以此回应着冰心对孩子们的关爱。冰心看过信后,会选出内容最重要或是最亟待回复的信件单独回复,其他信件则以《三寄小读者》系列通讯的方式,在文学期刊《儿童时代》上公开回复。信件往来间,冰心奶奶和小读者的心贴得更近了。

如果说大量小读者来信的出现是因冰心作品爱的感召而催生,那么欣欣向荣的国家、祥和安宁的社会就是孩子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强有力保障。小读者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看少儿读物、语文课学习才对冰心有所了解,但普遍没有冰心的通信地址,于是在写信时,孩子们表现出不同的想法,有的写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等处收,有的寄往出版过冰心作品的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处,还有的孩子干脆就只写了“北京作家冰心收”,虽然显得天真却又透露出莫名的信任。

事实上,在信件邮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用自己的兢兢业业、认真严谨回馈了孩子的信任,默默付出甘当传书的鸿雁,那些地址不准确的信息最终都能够送达冰心手中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地址不详或不对的小读者来信,信封上都会落有各单位的收发章、改寄批条,数个不同地区的邮戳,为这封信铺一条畅通的邮路,如地方作协转寄中国作协,中国作协转寄冰心处。

设想一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尚不发达,书信是重要的通信联络方式,各个单位每天收发的信件何其之多,尤其当时很多作者投稿都是依靠邮寄,一封薄薄的小读者来信夹在其中该是多么的不起眼,更何况收信人还不在于本单内,但是地方作协、中国作协、各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并未因为信封上稚嫩的笔迹而就此忽视了这些孩子们的信,而是认真对待,妥善转寄,务求不辜负每一封信上所承载的童心。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人们对祖国下一代的呵护在无声地传递。

现在冰心收藏多年的小读者来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模拟书房中展出,继续陪伴着冰心奶奶,同时向每一个来此的观众无言述说着冰心与孩子们之间关于爱的故事,启示人们细细体会这些看起来普通普通的小读者来信所传递出的丰富而深沉的人间大爱。

两岸宗亲齐聚同安 闽王信俗代代相传

厦门同安举办第九届闽王民俗文化节

台上舞者翩翩,罗衣随风飘舞,乐师青衫蓝裙,低头抚琴,孩童身着华服,声声吟诵不绝于耳;台下观众掌声阵阵,数百名专家学者,来自海峡两岸的王氏宗亲们认真观看表演节目,对演出赞不绝口……

10月22日,以“开闽第一·缘系厦金”为主题的2023年第九届同安闽王民俗文化节在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北辰山风景区举办。

唐朝末年,“开闽三王”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在同安北辰山兵变起义。后来,王审知主政福建之时,选贤任能,减轻徭役,降低税收,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效促进了福建的文化和文化发展,八闽大地告别“蛮荒海隅”,成为“海滨邹鲁”。

在王审知治闽的二十九年里,福建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千家灯火读书夜,万里桑麻商旅途”的升平景象,王审知由此被尊为“开闽第一”,后

世称之为“开闽王”,宋太祖御赐“八闽人祖”之匾,北辰山也因此得名“开闽第一山”。福建迈向文明之邦的历史大转折,与王氏三兄弟率义军入闽,平定闽疆密不可分。

海峡同根

两岸共祭“八闽始祖”

唐宋五代时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投奔义军,后因主帅多次滥杀无辜,义军在五显镇北辰山发动兵变。相传,当时军队群龙无首,众人期望通过拜剑选出新主帅,轮到王审知拜剑时,三拜而剑三升,众军士便要推举王审知为全军主帅。王审知以长幼有序为由,推举大哥王潮作为全军主帅,自己则作为副主帅。

“三王”在同安取得了义军的指挥权,奠定了后来王审知能够治理福建的基础。因此,北辰山也是闽王文化的孕

育地和最早的发祥地。”同安文史专家、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介绍。

“银城”同安有“海滨邹鲁之地、声名文物之邦”的美誉,是众多著名侨民、台胞的祖籍地。据《台湾县志》《澎湖厅志》等志书记载,宋元时期就有同安人移居澎湖。元代设澎湖巡检司,隶属同安县,兼管台湾民政。而金门原名渚洲,自古隶属福建同安。

历史上由于“迁界”、自然灾害等原因,金门许多家族内迁定居,开枝散叶,形成了众多的“金门村”。据调查数据显示,同安区内有“金门家族派系”的自然村落109个,占1998年《同安县地名志》在案861个自然村的13%,同安与金门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两岸重要的民间共同信仰,开闽王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本次同安闽王民俗文化节吸引了来自金门县、河南固始县的众多两岸王氏宗亲和信众前来参加。

“王氏宗亲在金门有6000多人,还有13间宗祠。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宗亲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祭奠开闽王。”金门王氏宗亲会代表王振汉说,金门曾属于福建同安县管辖,与如今的同安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更有“无金不成银”“无金不成铜”的俗谚。

同安与金门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渊源深厚。开闽精神与闽王文化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王氏宗亲的纽带,为加深两岸血脉亲情同根、同源、同信仰的认同感,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

研学交流

三地共建凝聚合力

舞蹈《闽王战鼓舞》《舞墨北辰》《北辰舞韵》,少儿吟诵《闽王颂》,还有《竹林兵变 拜剑拜师》动漫视频首发,以及

30多斤的“同安区最大的封肉”现场百人共同品鉴……本届同安闽王民俗文化节上,各项表演和活动精彩纷呈。

作为闽王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此前闽王民俗文化节已在同安北辰山举办了八届,有效增强了闽王的文化影响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打造辐射两岸的闽王文化地标。

“王公宫”始建于五代,最初是纪念王审知的生祠,后来由于历代加封,也有“广利庙”、“忠惠庙”等庙称……在工作人员的详细介绍下,孩子们围成一圈,认真听讲。

本次闽王文化节,还有50名小学生走进北辰山风景区参加研学活动,现场动手制作竹节人、同安封肉、同安炸枣、体验闽王行军大锅饭等。通过研学将历史知识串起来,焕发传统文化的魅力,促进闽王文化的传承。

“通过工作人员的解说,了解到王审知为五代十国时期福建的社会安定、

稳定,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就读于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的罗昊轩说,通过这些研学活动边走边学,平时读起来有些生硬晦涩的历史知识也变得更有意思。

与往年相比,本次文化节更加突出弘扬闽王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的延续和传承。

活动现场,同安区与金门县、河南固始县三地的闽王宗亲会签订共建协议,就弘扬闽王文化、传承开闽精神开展一系列共建合作,计划在2024年推出“闽王主题研学之路”旅游精品线路。

“接下来,将以闽王文化品牌为核心,以一个主线活动加上若干个支线活动,推动民俗文化、旅游、生活、产业融合发展。”厦门同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介绍,让开闽精神的核心文化作为基础和根基,不断延伸展开,形成产业化和延续性,同时增进两岸文化交流。(邱越胤 余雪燕 杨心亮)